

## 历史段子：是谁将科学硬塞进中国的？

张东生

今天在狂倒中医的斗士中不乏即反中医（伪科学）力挺西医（真科学），而同时又是反圣经理念的“极端无神论”者。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西医科学进中国的一些历史事实。按“民间”的说法，当年西方传教士以传福音为名大肆在中国各地兴建医学院和各种不同规模的医院，大到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长沙香港，小到河南的偏僻乡村，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其实他们那时治病不分贫富，是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冒死”在中国传播西医。例如加拿大人大山的爷爷当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22-1925年间是加拿大多伦多圣保罗教会在中国兴建的圣保罗医院的医生，并有一个惨痛的故事。大山在文章“河南‘寻根’记”中写到：“那年夏天，我带着我的儿子去了商丘。见到了一位老人，他的父亲曾经和我的祖父一起工作过。他还记得小时候和我的伯父们一起玩耍。从那里我了解到了很多有关于我家在中国的历史。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内军阀混战的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的祖父母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来到了中国，希望帮助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来，当地军阀的争斗愈演愈烈，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暴徒袭击了他们的医院，甚至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还袭击了他们的火车。更不幸的是，他们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中国却只带着其中一个回到了加拿大。我的两位年幼的伯父在这短短的两年里都先后染上了结核病，永远的葬在了中国。这极大的悲伤在我祖父母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回到加拿大后对家人很少提及在中国的事情的原因。太多的记忆，太大的痛苦。”



见 <http://www.dashan.com/cn/blog/shangqiu1.htm> 和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05/content\\_124021.htm](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05/content_124021.htm)。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幸亏中国人民省悟的早，坚决赶走了洋教，但是医学院医院赶不走，就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理把医院给留下，把洋教赶走了。同时这样做也符合极端唯物论的原则，人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留下医治身体的医术，赶走医治灵魂的圣经，不会损失什么。同时为了根除人们总把这些医院与基督教和圣经理念联系在一起的念头，就将所有与洋教有关的医学院和医院的名称改为人民医院等。也将“西方”也改称为“现代”，不是车，是现代医学。同时又为中医的成长创造了一个个伊甸园。不幸的是，中医强调继承，却继承不力，强调发展，但发展无术也无路。再看由西方洋教在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情况下，硬塞给中国人民的西医术，却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遍布城乡。上到某些权大于法的领导，以科学代言人说话的一些院士，中到以西医为业的一些敲骨吸髓者，下到一丝不挂的新生儿，都在这方面受益匪浅。中国民间“饮水思源”的传统再悠久再优良，也没人公开承认当年洋教士所传的这东西的确是“福音”。但是最近经过方先生何院士分析后，西医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绝对是科学。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放心地说，当年洋教士冒死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硬塞进中国的这东西不仅是福音，居然还是科学，原来是帮助中国人民早日摆脱“伪科学(中医)”的最佳武器。这也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当年从西方传教士所传的东西中取出的也真是其“精华”。

再说说当年被赶走的据说能医治“灵魂病患”的圣经，是不是“糟粕”。1949到1977年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极端唯物”最“极端无神”的年代。对整个民族来说，物质“丰富”，没得说，不就是多添加几个零吗，“人”说了算。精神那叫“抖擞”，更没得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也是“人”说了算。不信的话，你可以参阅当年以“唯物论和事实求是”而著称的报纸。殊不知中华民族为检验“极端唯物”和“极端无神”的“优越性”和“科学性”付出了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代价，科学的西医也没能阻止数千万中国人在短时期内的非正常死亡(传说的数字未经证实)。对个人来说，直到改革开放，物质稍丰富一点儿时，早年赴法求过学的邓小平先生发现了问题，于是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建议。这表明他挣脱了极端唯物极端无神的教条束缚。但是做具体工作的下一代(留过苏或没有留过学)只知道物质是世界的唯一存在形式，除此之外不可能还有其它东西，一手抓物质不就抓住所有的东西了，怎么可能还有物质以外的东西可抓呢？于是只在道德宣传和完善法制上做了很多工作，是有成效。但就连象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心等制订律法的人都没有能拯救，更何况知法不多的各层下级人员呢。

其实当年洋教士冒死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硬塞进中国的东西中，除科学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信仰理念，是与中国那些土生土长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完全不同的一种理念，是圣经中的“神”的理念。圣经中神的律法虽严，但不是鞭打人类罪犯皮肉的，是在人心里鞭打犯罪“动机”的。通过鞭打人心里“罪的动机”来制止犯罪行为，从而实现对这个人的“拯救”。拒绝罪前拯救，就增加了受到犯罪行为实施后，来自人的法律所给予毁灭性打击的风险。吕某某曾在美国学习自然科学七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数年后，因买凶杀妻被处死刑。如果你说是他不懂法律，错了，他官位已达副省长。难道在美国七年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句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吗？据说抓捕他时，是以健康检查为诱饵，将他骗到高级病房后实施的。可见他“崇尚科学”的功底不会很差，连司法人员都知道他的这一特点。但此时的科学和法律只能确保他必须按时死去，没有任何拯救功能。这话题太沉重了，是吧？以上历史和示例表明一个道理，当年被“极端无神”赶走了的圣经中能净化灵魂的“福音”，一定不是“糟粕”。

等中医退出历史台面后，“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能否改成“医药治标（身体疾病），信仰治本（灵魂罪

性）”，尚无法确定。希望到那时经过何院士分析后，给“信仰”一个合乎那时政治气氛的，被包括在科学范畴之内的称呼。因为现在谁被科学不认可的任何东西所害，都有可能被贴上“可耻”的标签，这已给社会进一步歧视他们，发放了通行证。我国的的确确还有千千万万个“祥林嫂”，被有充裕条件“享受”科学的人们视而不见。万一其中一个被留过洋的你碰上，不要象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留洋生，让祥林嫂那“崇尚科学”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而彻底崩溃掉。

鲁迅在1924年写的小说《祝福》中，用隐喻手法揭露了中国土生土长传说中的“妖魔鬼怪”是如何被百姓们运用自如，并将理论与祥林嫂的实际相结合，一步一步最终将她送入了人间精神地狱的。同年大山的爷爷恰在中国“帮助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大山在文章的最后写到：“我开始意识到也许他们在中国所度过的岁月和我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而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来到这个国度，彼此的经历相差甚远。也许我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功与他们曾经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和巨大牺牲有着某种联系。无论是巧合还是缘分，我希望我在中国的工作和经历能够让我的祖父母感到自豪，我希望他们在九泉下能够感到欣慰。”



(笔者注：1912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河南传教区创办圣公会医院，医院受加拿大圣公会圣保罗教堂资助，定名为圣保罗医院。1915年，圣保罗医院迁址归德府城内，现为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笔者曾在这所医院工作

过数年, 照片上这座楼房曾经是该医院的集体宿舍, 笔者在这座楼房里居住过两年。)

原载于“星空细雨” (<http://xkxy.org>), 11-6-06, 标题和内容都有改动。

(如果读者还想知道细胞“染色体”, “DNA 分子”, “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和“细胞凋亡”等生命中最要紧的环节与圣经文字的“巧合”关系, 请参阅“星空细雨”的系列文章, <http://xkxy.org>).

张东生, 04-03-2007, 于辛辛那提, [dongshengzhang\\_1@yahoo.com](mailto:dongshengzhang_1@yahoo.com)